

Alternative Futures and Popular Protest 2026, The conference will be
held in Manchester on June 15-17, 2026.

今天我们在讨论“另类未来与大众抗议”时为什么要重温历史学家
汤因比？

马惠娣

(2025 年 12 月 7 日)

摘要：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其代表作《历史研究》中，以中国传统“阴-阳”思想为理论灵感，提出了著名的“挑战与应战”理论，将和平主义与多元共存确立为其历史观的核心价值。1974 年，他在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话中直言“最愿降生于公元 1 世纪的中国新疆”，这一独特选择引发我们的深刻思考：汤因比做出如此的选择？公元 1 世纪的中国新疆呈现出怎样的文明图景？这一历史图景对“另类未来与大众抗议”等现代议题的讨论又能提供何种启示？

在当代社会背景下，大众抗议的本质往往是社会群体对发展失衡、权利受损的合理诉求，其解决之道并非对抗与压制，而在于制度优化的权利保障，以良性互动打破垄断与歧视的壁垒。构建“另类未来”、回应大众诉求的核心，正在于以平等对话消弭群体隔阂，以包容胸怀促进多元共存——这恰与汤因比推崇的历史观一脉相承。然而，在当今利益格局固化、价值冲突加剧的背景下，汤因比的历

史观正面临诸多现实挑战。

本文以文献研究为核心方法，通过回溯公元 1 世纪中国新疆多文明交融共生的历史实料，解析汤因比历史观的思想渊源与价值内核，突破纯理论思辨或单一历史叙事的局限，搭建起历史智慧与当代议题的对话桥梁，以探寻其对当代社会化解矛盾、构建包容发展秩序的现实意义，为回应“另类未来与大众抗议”等议题提供历史维度的思想参照。

关键词：汤因比 历史观 公元 1 世纪新疆 当代启迪

引言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以《历史研究》奠定学术地位。这部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分阶段推出的巨著，核心在于打破单一文明视角，借鉴中国阴-阳观念¹提出“挑战与应战”理论，即适度挑战与有效回应催生文明，而包容与活力才是关键。

1974 年，85 岁的汤因比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对话时，池田大作问汤因比，“您希望出生在哪个国家？”他面带笑容地回答说，希望生在“公元一世纪佛教已传入时的中国新疆”。²这一选择折射了他的历史观的一个侧面。

据史料记载，公元 1 世纪的新疆（史称“西域”），在汉朝西域

¹ 张文杰. 中国传统文化与汤因比的历史哲学. 哲学中国网, 2015-07-14

² 池田大作著，苟春生等译，《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7 年中文版

都护府治理下，城邦共存、商贸繁盛，佛教与本土信仰交融共生，构成多元文明图景。当时的这片疆土对来自自然、地缘、文化的挑战做了有效的回应，契合了汤因比的文明发展的逻辑，也为他的历史观奠定了基础。这一选择，既提供了人类向往文明发展的具象图景，也显现出跨越时空的参考价值。³

如今，世界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局：一方面，围绕各类利益的博弈日趋激烈，地区冲突此起彼伏；另一方面，南、北发展鸿沟持续拉大，社会撕裂现象愈发凸显。在此背景下，汤因比的文明发展理论与公元一世纪西域的文明实践样本，不仅为“另类未来与大众抗议”的讨论议题展示了历史坐标，也为我们审视当下提供了诸多启示。

一、汤因比的历史观及如何形成？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1889－1975），早年毕业于牛津大学古代学专业，专注于希腊、罗马、拜占庭等古代文明研究，后以代表作《历史研究》成为英国历史学家。这本书写作历史跨度 30 年。写作起始于 1927 年，至 1961 年，汤因比通过学术研究、实地考察与履行国际事务逐渐形成了他的历史观。同样，他借助学科背景、史料典籍与实地考察等路径了解公元 1 世纪的新疆。并影响了他的历史观的形成。

（一）学术研究与著作撰写：1927 年汤因比正式动笔撰写《历

³ 同上。

史研究》⁴，并分阶段发表核心内容，先后发布出版“文明的起源”、“文明的成长”、“大一统国家”，以及“文明的接触”等主题的卷本，逐步完善了理论体系。同时他长期担任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相关职务，主持编辑《国际事务综览》，持续观察分析国际局势，为其文明兴衰与互鉴等理论积累了素材。此外，他还通过研究 26 个主要民族文明的兴衰轨迹，打破国别研究的局限，确立了历史研究的新方法。

（二）实地考古与跨国考察：早年他曾加入雅典考古学院成为研究生，并前往希腊开展考古工作，深耕希腊和罗马古代史，为“文明的比较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1921-1922 年，他游历希腊与土耳其并记录相关见闻，写成《希腊与土耳其的西方问题》。1929 年他首次到访中国，在北京、上海等地停留，1967 年再次访华，这些经历让他近距离接触中华文明，为其研究中西方文明互鉴提供了一手资料。

（三）参与国际事务的经历，汤因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职于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司；1919 年，以英国代表团中东地区专家的身份出席巴黎和会；二战结束后，再度参与巴黎和会的相关事务。这些经历，既积累了他的实践经验，也让他亲眼见证战争对人类文明的重创，深化了他对文明冲突本质与和平价值的思考，也确立其“挑战与应战”理论的提出，与和平主义的立场。

⁴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12 卷本并非一次性出版，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首发，出版跨度近 30 年：1934 年出第 1-3 卷，1939 年出第 4-6 卷，1954 年出第 7-10 卷，1961 年出第 12 卷（第 11 卷融入相关卷次修订补充）。1946 年，该书前六卷的索麦维尔缩写本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在伦敦首发，1947 年于美国纽约出版。

(四) 关注新疆研究的学术轨迹。汤因比虽未撰写研究新疆的专著，但作为深耕多文明历史的学者，他对新疆的关注是建立在当时西方学者在学术与考古层面的考证成果：1877 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首次提出“丝绸之路 (Seidenstrasse)”术语，界定汉代中国与中亚、印度间的文明贸易通道；1893 年德国东方学家 A·格林威德尔出版世界首部犍陀罗艺术专著《印度的佛教美术》，为他解析佛教东传路径提供理论支撑；英籍匈牙利学者斯坦因对吐鲁番、和田、敦煌的系统性考察尤为重要，其 1907 年《古代和田》首次系统报告新疆考古成果，1912 年《沙漠契丹废址记》详细记录楼兰、敦煌文物细节，这些成果共同勾勒出丝路文明交融的图景。1929 年他的中国之行成为重要契机，汤因比在华期间实地走访并撰写《中国纪行》，近距离接触到大量西域与中原文明深度关联的历史信息，这让文献与考古中的记载变得更为具体可感。⁵

汤因比毕生致力于文明空间的接触与互动研究，而丝绸之路作为东西方文明交汇融通的枢纽，自然成为其研究的重要切入点。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最终，他将目光精准聚焦于公元 1 世纪这一特殊历史阶段。

二、“公元 1 世纪的新疆（时称”西域“）

1974 年，日本学者池田大作与 85 岁的汤因比会晤十日，当被问及“最希望出生于哪个时期的哪个地方”时，汤因比答道：“公元 1 世纪佛教已传入的中国新疆”。⁶

⁵ 上述历史事件均参考“百度百科”相关词条。

⁶ 池田大作著，荀春生等译，《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

(一)、“公元 1 世纪的新疆”是什么样子？

公元 1 世纪的新疆，处于汉朝西域都护府有效管辖下，天山南北城郭诸国并存，汉朝通过册封、调解维持稳定秩序。作为丝绸之路核心枢纽，这里有中原丝绸、铁器与西方物产的双向流通，汉代五铢钱与本地货币并行，商贸活力充沛。佛教此时已越过葱岭扎根局部区域，疏勒莫尔寺遗址印证了犍陀罗艺术（犍陀罗艺术是古希腊艺术与印度艺术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特殊佛教艺术样式，又称“希腊式佛教艺术”。）与地域文化的初步融合，佛教与本土信仰共存，呈现出多元文明碰撞交融的特质。社会形态以城邦聚居为主，游牧与农耕结合，宗教空间与居民聚落配套发展，形成多元融合的生活图景。⁷

(二)、汤因比将公元 1 世纪的新疆视为理想选择的深层逻辑，正与其“挑战与应战”的范式相契合：西域复杂的地理禀赋与汉匈地缘博弈，构成了文明存续的自然与政治双重挑战；佛教东传的浪潮，则进一步带来文化适应性的全新课题。而西域都护府的柔性维稳、城邦间的商贸互补、宗教信仰的本土化探索，恰是对这些挑战的有效回应，最终构筑起动态平衡的文明发展模式。

(三) 这种“柔性治理+城邦自治”的政治生态、文化平等交融的开放氛围、互利共赢的商贸格局，因摒弃了霸权压迫与强制扩张的逻辑，与汤因比反对经济扩张、主张文明和平共存的理念不谋而

出版公司，1997 年中文版

⁷ 参见齐东方等人，“驼铃渡远，玉帛通衢：丝路胡商与汉唐社会的文化交流”，汲古论坛第四十期 2025 年 12 月 16 日

合，并且精准地匹配了他的“内在活力优先”的价值判断。

这片土地虽无广袤疆域与高超技术加持，却在经济适配性、文化创新力与社会形态的灵活调适上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正是他所推崇的“文明生长”的理想样态。

三、对当代“另类未来与大众抗议”的启示

（一）、以建设性回应化解抗议冲突

当代社会权利意识觉醒推动抗议活动常态化，这类表达聚焦发展失衡、权利保障缺位、资源分配不公等现实困境，其本质并非制造对抗，而是向社会治理提出建设性诉求。面对这一挑战，简单压制与割裂只会加剧矛盾，唯有制度优化的权利保障、依托协商机制搭建平等对话平台、借助资源调配弥合发展鸿沟，以创造性的“有效应战”将抗议势能转化为社会革新动力，才能实现从冲突对立到协同共治的良性升级。

（二）、以多元包容构建另类未来图景

“另类未来”的核心要义绝非文明或制度的单一化，而是尊重国家、族群、文化的天然差异性。这需要建立平等对话的国际秩序，破除文化歧视与身份偏见，推动发展模式的多元互补，让不同群体在包容共存中实现互利共赢。同时，需以抗议诉求为镜鉴，直面行业垄断与阶层固化等问题，保障个体发展权与创造力；立足本土亦吸收外来经验，摒弃生搬硬套的僵化模式，让社会在开放包容的生态中持续迸发创新活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以和平主义坚守社会变革底线

汤因比亲历两次世界大战后，将和平主义确立为历史观核心价值，这一立场在当代语境下更具现实意义。暴力对抗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反而会引发文明倒退、社会失序——无论是地区冲突中的武力交锋，还是社会抗议中的极端行为，最终都会侵蚀普通民众的根本利益。守护社会变革的底线，关键在于让不同的“人与人、群体与群体、文化与文化的和平共存”，为各类诉求的解决与未来的发展划定非暴力的基本准则。

综上，面对当代社会变革中的多元诉求与发展挑战，核心价值的选择在于：以建设性姿态回应诉求、以包容心态接纳差异、以和平理念守护人类理想。这三者相互支撑，共同指向一种兼顾矛盾化解与长远发展的理性路径，既不回避发展中的现实困境，又拒绝对抗与暴力的破坏性逻辑，最终通过协同共治、多元共生、和平渐进的方式，推动社会实现更具韧性与包容性的进步。毋庸置疑，汤因比的历史观，为讨论当代的“另类未来与大众抗议”提供了独特的历史坐标系。

四、现实人类社会面临的诸多挑战

汤因比的历史观自问世以来，便在西方学术界引发持续争议。皮季里姆·索罗金批判其将文明兴衰简化为“挑战-应战”的单一公式，割裂了社会结构、文化价值与经济基础的多元交互作用⁸；费尔南·布罗代尔等学者指出其对历史复杂性解释乏力、归因流于理想

⁸ Pitirim A. Sorokin,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12, No. 3 (Sep., 1940), pp. 374–387

化⁹；休·特雷弗-罗珀等则批评其观点“亵渎西方文明”¹⁰。

诚然，这些批判与质疑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但汤因比的历史观在当下仍不乏启示意义。

当然，今日世界早已迥异于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远比往昔复杂。以欧洲为例，在移民压力加剧、经济增长停滞、社会焦虑蔓延与传统精英公信力下滑的多重背景下，多国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持续攀升。这类政治力量普遍标榜民族认同、主张主权优先、反对精英政治，同时对欧盟一体化进程持强烈怀疑态度。在此局面下，无论是鸽派还是鹰派政党都陷入两难境地。欧洲的情况并非孤例，此风正在全世界蔓延。

（一）地缘政治冲突与霸权扩张的持续加剧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进入深度调整期，部分国家秉持“文明优越论”与霸权思维，推行单边主义、集团政治，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之上。地区冲突此起彼伏，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危机交织蔓延，军事对抗的风险持续上升。这种以扩张与压制为核心的行为，背离了汤因比所推崇的“和平共生”理念，不仅对局部地区的文明成果造成重创，更让全人类面临“过度挑战”下的文明衰退风险。

（二）文明隔阂与文化冲突的日益凸显

在全球化退潮与民粹主义抬头的双重影响下，不同文明间的误

⁹ Fernand Braudel, Toynbee'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2, No. 3 (1947), pp. 316–323

¹⁰ Hugh Trevor-Roper, Arnold Toynbee's Millennium, *Encounter*, Vol. 5, No. 8 (Jun., 1957), pp. 14–28

解与偏见持续加深，“文明冲突论”的阴霾挥之不去。部分群体将自身文化视为唯一“正统”，对异质文化采取排斥、歧视甚至打压的态度，导致文化多样性遭到破坏。宗教对立、种族偏见、身份政治撕裂社会，不同群体间的沟通桥梁逐渐断裂，正在成为阻碍人类共同发展的重要屏障。

（三）发展失衡与社会撕裂的不断恶化

全球范围内，南北发展鸿沟持续拉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资源分配、技术垄断、规则制定等方面的不平等日益突出。即使在同一国家内部，阶层固化、贫富分化的问题也愈发严峻，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加剧了社会矛盾。部分群体因缺乏发展机会、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而产生被剥夺感，最终引发大规模社会抗议。

（四）生态危机与可持续发展的严峻困境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带来了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全球性生态挑战。极端天气频发、生物多样性减少、环境污染加剧，不仅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基础，更引发了一系列衍生矛盾，如资源争夺、生态移民、环境正义诉求等。这些生态挑战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自然挑战”，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碎片化、部分国家的“生态保护单边主义”，导致应对行动难以形成合力。

（五）技术垄断与人文关怀的严重脱节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世界科技巨头凭借技术优势形成垄断，掌

控数据资源与行业规则，加剧了社会不公；算法歧视、隐私泄露、就业结构失衡等问题，让弱势群体面临更多生存压力；而技术的滥用甚至可能引发伦理危机与社会失控风险。技术本应是服务于人类文明进步的工具，但当前技术发展与人文关怀的脱节，导致其未能充分转化为文明生长的动力，反而成为加剧社会撕裂、扼杀内在活力的新枷锁。

五、结语

汤因比的历史观虽饱受批判质疑，其和平主义与多元共存理念也在现实利益博弈中面临重重考验，但仍能为我们提供面向未来的行动启示——文明进步从来不是对过往范式的简单复刻，而是回应新时代课题的理论与实践双重革新。

从新视角审视，这份启示源于对文明形态的深度再思：汤因比青睐公元1世纪的新疆，本质是向往“动态平衡型文明”，既非无底线妥协，也非强权式征服，而是以柔性治理与多元共生为基、利益共享与价值互鉴为要的生态模式。这直接指引“另类未来”的构建方向：打造“韧性共生体”，国内兼顾效率公平、凝聚共识，国际摒弃霸权、推动权责利对等。

基于这一文明认知，新观点主张突破传统“应战”逻辑的局限，需意识到当代风险社会的挑战更具隐蔽性、全球性，单纯回应已难以为继，需以“预判-协同-迭代”的主动逻辑取而代之。我们应融合西域柔性治理智慧与现代风险治理理念，构建“预警-沟通-协商治”的机制，破解治理困境、适配动态挑战。

这一认知，需依托新方法搭建实践桥梁：建构“历史智慧数字化+跨文明实践网络化”框架，以数字人文技术将文明兴衰案例转化为量化数据支撑，搭建跨文明实践案例库，分享柔性治理、多元协商的实操方案，让抽象理论转化为可复制的实践范本。

当今世界，地缘冲突、文明隔阂、发展失衡等挑战凸显，汤因比的历史观既是价值坐标也是行动指南。唯有以命运共同体替代对抗性竞争，以主动式治理回应风险挑战，以数字化赋能激活历史智慧，凝聚全球共识，构建兼具包容性、韧性与可持续性的“另类未来”。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Braudel, F. (2006). *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R. Mayne, Tra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3)
- Ikeda, D., & Toynbee, A. J. (1976). *Choose Life: A Dialogue Between Arnold J. Toynbee and Daisaku Iked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orokin, P. A. (2006). *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 (Vols. 1-4). Transaction Publisher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7 – 1941)
- Toynbee, A. J. (1934 – 1961). *A Study of History* (Vols. 1 – 1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oynbee, A. J. (1961). *A Study of History* (D. C. Somervell,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bridged edition of the 12-volume set)

Trevor-Roper, H. (1957). *Arnold Toynbee's Millennium. Encounter*, 8(4), 3-16.

**Why should we revisit the historian Arnold Toynbee when discussing
"alternative futures and public protests" today?**

Abstract: Arnold Toynbee, a prominent British historian, drew theoretical inspira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oncept of "Yin and Yang" in his magnum opus *A Study of History*, and proposed the well-known "Challenge and Response" theory. He established pacifism and pluralistic coexistence as the core values of his historical outlook. In 1974, during his dialogue with the Japanese scholar Daisaku Ikeda, Toynbee explicitly stated that "he would most like to be born in Xinjiang, China in the 1st century CE." This unique choice sparks profound reflections: What were the inherent motivations behind Toynbee's decision? What kind of cultural landscape did Xinjiang, China present in the 1st century CE? And what insights can this historical landscape provide for discussions on modern issues such as "alternative futures and public protests"?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public protests are often essentially reasonable appeals from social groups regarding unbalanced

development and violated rights. The solution does not lie in confrontation or suppression, but in strengthening rights protection through institutional optimization and breaking down barriers of monopoly and discrimination via positive interaction. The core of building an "alternative future" and responding to public appeals lies in resolving group estrangement through equal dialogue and promoting pluralistic coexistence with an inclusive mindset — which is precisely in line with the historical wisdom advocated by Toynbee. However,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rigid interest structures and escalating value conflicts, this historical outlook centered on pluralistic coexistence is currently facing numerous practical challenges.

Adopting literature research as its core method, this paper traces back to the historical scene of the integration and coexistence of multiple cultures in Xinjiang, China in the 1st century CE. It analyzes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and value core of Toynbee's historical outlook, and further explores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resolving conflicts and building an inclusive development order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reby providing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for addressing issues such as "alternative futures and public protests."

Key Words: Arnold Toynbee; Historical Outlook; Xinjiang in the 1st century CE; Alternative Futures and Public Protests; Civilizational Coexistence

